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

——重温列宁《论我国革命(评尼·苏汉诺夫的札记)》

□ 崔志雄

《论我国革命(评尼·苏汉诺夫的札记)》，是列宁1923年1月16日和17日口授的一篇具有纲领意义的重要文章。在这篇不到3000字的短文中，列宁总结了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经验，批驳了普列汉诺夫、考茨基、苏汉诺夫等人借口俄国缺乏实现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前提来否定十月革命的论调，科学回答了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应不应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能不能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等根本性问题，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学说，为后人研究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留下了宝贵的思想遗产。

革命时刻要有极大的灵活性

十月革命让俄国走在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前列，但落后的经济文化，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也对这个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提出了严峻挑战。十月革命是一个悲剧性的错误，还是一次史无前例的伟大创举？站在不同的立场，人们给出了各自的答案。

普列汉诺夫声称，“俄国历史还没有磨好将来要用它烤成社会主义馅饼的那种面粉”，工人阶级在还没有准备好之前就夺取政权，只能意味着“把它推上最大的历史灾难的道路”。考茨基也打着经济分析的幌子攻击十月革命，认为俄国并不具备社会主义在物质上和思想上的前提条件。他将十月革命比喻为一个怀孕妇女疯狂万分地猛跳而引起的“早产”，预言这样的孩子“通常是活不成的”。孟什维克党人苏汉诺夫也站在了批评十月革命的立场上，他撰写了7卷本《革命札记》，记述了俄国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历史，指责列宁缺乏对俄国实现社会主义的“客观前提”的分析，断言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

面对苏汉诺夫等人对十月革命的责难，列宁给予了针锋相对的回答。列宁提出，“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这是“无可争辩的”。然而，用这个论点来否定十月革命的人，决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十足的改良主义者。毫无疑问，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经济发展的一定历史条件是社会革命的前提。但在同时，他们也强调，社会革命并不是单纯的经济过程，而是各种特定的主客观条件交互作用的产物。把经济因素说成是历史过程中的唯一决定性的因素，只会“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

列宁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把俄国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也造就了能够实现“农民战争”同工人运动相联合的条件。“面对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所造成的那种革命形势的人民，在毫无出路的处境逼迫下”，他们必然要奋起斗争，不失时机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不是照抄照搬资本主义在西欧发展的道路。

相比之下，苏汉诺夫等人虽然自称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们用以反对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金科玉律”，显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只是一些教条主义。“他们对过去的盲目模仿”，“一谈到稍微离开一下德国的榜样”也要持保留态度。究其根源，在于他们一点也不理解“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对马克思的“在革命时刻要有极大的灵活性”这个指示，他们完全不理解，甚至没有注意到。

用革命为建设社会主义创造前提

人类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引起的。没有生产力的发展，各种社会形态的依次更迭是难以想象的。与此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既要从事世界历史的普遍联系，而不是单独一个国家出发去考察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又要重视某一个国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具体状况，避免抽象地谈论生产力发展水平高低与社会革命的关系。显而易见，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

苏汉诺夫等人认为十月革命不应该发生，而且认为不应早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的结论，其原因就在于他们只是机械地、形而上学地理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

法。他们只看到“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发展在西欧发展的这条固定道路”，并以为这就是世界发展的一般规律，而没有认识到历史发展是一般性和个别发展阶段特殊性的统一。“他们根本不相信任何这样的看法：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

当然，列宁肯定俄国可以改变一下历史发展顺序，并不等于说他忽略了生产力的决定作用。恰恰相反，他始终高度重视这个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强调利用政权的力量发展生产力，用革命为建立社会主义创造客观经济前提。他提出了“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的命题，强调“而没有工业，我们就会灭亡”，认为“只有当国家实现了电气化，为工业、农业和运输业打下了现代大工业的技术基础的时候，我们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

针对苏汉诺夫等人的批评，列宁质问道：“你们说，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好极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为这种文明创造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你们在哪些书本上读到过，通常的历史顺序是不容许或不可能有这类改变的呢？”“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

“首先要投入真正的战斗，然后便分晓。”回顾十月革命以来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程，列宁指出，我们“然后就看到了像布列斯特和约或新经济政策等等这样的发展中的细节（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无疑细节）。现在已经毫无疑问，我们基本上是胜利了”。

东方国家革命将带有更多特殊性

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

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但由于国情不同，各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也会具有不同的特点。马克思在晚年的思考中批判了那种将他的西欧资本主义起源论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的观点，强调不能够用西方经历过的过程来强制规范经济落后国家，尤其是东方社会的发展。列宁也在论证十月革命必然性的同时，将目光投向了比俄国更加落后的东方国家。

列宁将俄国定位于西欧和东方国家之间的国家，指出俄国国情决定了俄国革命有别于以前西欧各国的革命，具有自己的特殊性，“而且这些特殊性到了东方国家又会产生某些局部的新东西”。同时，由于东方国家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因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革命带有更多的特殊性”。十月革命后，列宁在探索落后国家革命问题时提出的关于各国共产党必须帮助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运动等观点，揭示了东方国家革命的特殊性。而对于以苏汉诺夫为代表的那些人来说，由于他们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东方国家革命的这些特殊性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的。

中国革命的历史证明了列宁的预言。立足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路线和纲领，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三大改造”创造了对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平改造的先例，在中国确立起社会主义制度。

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发展历史辩证法的阐释至今依然富含生机，充满活力。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继续书写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依然要求我们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领导干部如何交出一份令我们党和人民满意的答卷？《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20年第5期聚焦“用担当作为书写大考答卷”，邀请7位地方领导干部撰文作答。

面对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战大考，山东省委常委、青岛市委书记王清宪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统筹稳增长转动能》一文中，强调要处理好三对关系：面对疫情对开放发展带来短期强冲击，必须处理好挑战与机遇的关系，坚定信心、危中求机、化危为机；能否立足当前的危困看到未来发展的机遇，必须处理好眼前与长远的关系，统筹稳增长和转动能；改革是推进所有工作的重要的方法论，必须处理好改革与发展的关系，以改革的逻辑增强发展动力。

浙江省委常委、温州市委书记陈伟俊在《彰显建设“重要窗口”的责任担当》一文中，总结了温州应对大考的八条深刻启示：“党的领导、制度优势”是根本保证；“战略清晰、战术精准”是制胜关键；“控制源头、阻断传播”是治本之策；“早字为先、救治为重”是首要准则；“畅通循环、恢复生产”是基础环节；“危中寻机、化危为机”是应变要诀；“平战结合、系统治理”是基本要求；“众志成城、同舟共济”是核心保障。

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韩立明在《以科学的务实行动应对大战大考》一文中，介绍了应对大战大考的体会：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统一指挥，是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根本保证；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是疫情防控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紧紧依靠群众联防联控、群防群治，是遏制疫情蔓延扩散的关键举措；注重精准施策、因时因势调整工作着力点，是把握“两手抓”主动权的现实需要；用好统筹兼顾的方法论，是应对大考赢得大成的科学引领；在战疫中整合力量、强化认同，是展现城市人文关怀的有效方式。

北京市平谷区是目前北京唯一零病例的区域。平谷区为何能一直保持零疫情？北京市平谷区委书记王成国在《守好社区疫情联防联控第一线》一文中，给出了答案：社区是疫情联防联控的第一线，也是外防输入、内防扩散最有效的防线。把社区这道防线守住，就能有效切断疫情扩散蔓延的渠道。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这一指示要求，北京市平谷区紧紧抓住社区（村）这一基础阵地，抓好疫情防控，探索推进基层组织建设和基层治理体系建设，健全完善基层党组织、制度体系和工作机制，逐步完善基层治理体系，有效提升了疫情防控水平，切实增强了基层执政能力。

如何打好疫情防控与脱贫攻坚两场硬战？四川省巴中市委书记罗增斌在《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打赢脱贫攻坚战》一文中，交出了答卷：巴中市始终把脱贫攻坚作为最大的政治责任、最大的民生工程 and 最大的发展机遇，坚持底线思维，把农村疫情防控作为决胜脱贫攻坚的坚固防线；坚持精准思维，把最大限度降低疫情影响作为决胜脱贫攻坚的关键一战；坚持辩证思维，把构建特色优势产业体系作为决胜脱贫攻坚的持久动能；坚持系统思维，把汇聚各方力量作为决胜脱贫攻坚的坚强保障，坚持“战疫”与“战贫”两手抓两促进，奋力在常

用担当作为书写大考答卷

□ 吕红娟



态化疫情防控中夺取脱贫攻坚全面胜利。云南省普洱市与老挝、缅甸、越南三国毗连，如何在大战大考中守好国门安全？普洱市委书记卫星在《牢牢把住关口守好国门安全》一文中介绍了做法。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组织动员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以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的政治担当，把疫情防控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强化统筹，按下全面复工复产“快进键”，在大战大考中践行初心使命，牢牢把住关口守好国门安全，向党和人民交出了合格答卷。

疫情发生后，湖北省潜江市果断采取封控措施，有效控制了疫情蔓延。潜江市委书记吴祖云在《全面从严从容应对大考的能力》一文中，结合潜江的做法谈应考体会：作为新时代的领导干部，应对严峻复杂局面，必须全面提升决断、动员、组织、打赢、治理、恢复、谋远等七种能力。这七种能力只是干部从应对大考的部分能力，仍然属于“术”的范畴。只有与清晰的政治鉴别力相结合，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视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了人民敢于牺牲一切，才会有忠诚与担当的浩然正气，才修得了党和人民所需要的“德”与“道”，才能获得满前面前的那个顶天立地的“1”。

钱穆（1895—1990年），国学大师，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他曾任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南联大等10多所大学的教授，著有《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等几十部著作。他学识渊博，融会中西，贯通古今，治学范围涵盖史学、哲学、文化学、教育学等。他一生治学以弘扬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在著书立说、从事教育过程中形成的治学智慧，对当下学人的成长具有启示意义。

“以通与专两字来作衡论”

钱穆的治学是纵横贯通式的。他在《师友杂忆》中总结自己一生治学时说：“从学术思想方面言，余则以通与专两字来作衡论。”他最初从文学入手，遂治集部，又因文见道，转入理学，再从理学反溯至经学、子学，然后进入清代的考订训诂，“所读书益多，遂知史学”，并以史学立场打通经、史、子、集各种学问。钱穆指出，前人研究诸子的通病之一是“各治一家，未能贯通”。他泛论诸子，“凡先秦学人，无不一一详考”，其目的旨在会通。会通不仅指通于其他门户，而且在会通之外，还要有整体的眼光，即对中国文化脉络清晰且自成体系的价值体认。

钱穆读书治学态度极其认真，在有心得处便进行专题性的研究。钱穆所处的时代，西方学术的专门化趋势

已经袭来，而他走出了自己独特的“以通驭专”的道路。他说：“从来大学问家，莫不遍历千门万户，各处求入，才能会通大体，至是自己乃能有新表现。”因此，会通与专门的区分在钱穆那里，仅仅只是出于表达的需要，实际上会通之中有专门，专门之中有会通，两者很难截然分开。从专门经过会通再回到专门的每一次循环往复，都是一次螺旋式上升的过程，最终钱穆将所学化为己有，自成一家。在他的研究领域中，专则极其专，如《刘向歆父子年谱》以《史记》《汉书》为基本依据，列举二十八证，反驳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通则极其通，如《国史大纲》《国学概论》等，对中国文化古今上下千年的发展，有极深广的阐发。正是兼具会通与专门功夫，钱穆得以在治学研究中取得丰硕成果。

“温情与敬意”

钱穆治学始终饱含着对中国传统

文化的尊重与温情。在其代表作《国史大纲》中，他充分表达了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态度，“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其中“温情和敬意”提纲挈领地反映出钱穆对传统文化的深厚情感。

钱穆出生在中华民族内忧外患、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力都受到严峻挑战的时代。当时的中国满目疮痍、岌岌可危，亡国论调和民族虚无主义甚嚣尘上，西方文化大潮如巨浪涌来。面对全盘西化的论调，他没有随波逐流，始终对于中国文化保有真诚的信念，力求在中国文明系统的框架内进行客观的了解，在固有文明的真相基础上重新审视中国文化传统，以复兴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重拾民族自尊和自信为己任。这种温情和敬意同样表现在钱穆对于自身学术思想理念的坚守上。在他看来学问需要

——钱穆的治学之道

□ 焦丽萍

择善固执，坚持自己的路向，笃信好学尤为重要，学者之始事，在信不在疑。要对前人的成果给予充分的尊重，虚心学习前人的优点，学问才能增进。

“每若守旧”“实求维新”

“守旧”与“维新”这一命题，不仅贯穿于20世纪中国学术史的始终，而且与整个20世纪中国的历史密切相关。钱穆因其一生笃信中国传统文化，往往被视作守旧派。而事实上，他的学术研究没有固守陈说，而是旁征博引，不乏新论。1988年，他在为《国史新论》所作的再版序中说：“故余之所论每若守旧，而余持论之出发点，则实求维新。亦可谓为余治史之发踪指示者，则皆当前维新派之意见。”创建新史学，撰写新通史，是钱穆史学实践的主旨。

1940年，钱穆的主要史学代表作《国史大纲》上下册出版。该书既继承

了中国传统史学的通史风格，又是他通史编纂理论与方法在实践中的运用。他提出了“以记诵考订派之工夫，而达宣传革新派之目的”的史学路向，强调历史不单是一堆材料，“该从材料搜集之上更深入推进见解眼光方面”，应随时代的变迁而改写，编纂为时代所需的新通史。钱穆的治学路径基本上秉承了中国传统史学的体系，但在历史结论上敢于求新而论。他同时强调，“今求创建新的古史观，则对近人极端之怀疑论，也应稍加修正”。他坦率地表明自己不同于古史辨派的一味疑古，而是在求真的基础上提出新说。他的一系列学术著作都体现了维新的价值诉求。

“治学本所以致用”

钱穆治学秉持了经世致用的文化传统。他曾谈过“学”与“用”的关系，“以事业为其学问之中心者，此即所谓‘学以致用’”，“吾人之所以从事于学、学为人，其主要动机及其终

极意义，乃对社会人群有用、有贡献”。在学以致用目的论的指导下，钱穆不论从事学术研究，还是创办书院从事教育，始终坚持“治学本所以致用”。

在钱穆的史学实践中，时时贯穿和体现经世致用的治史宗旨。他反对详古略今的撰史主张，强调撰写为时代所需要的通史“应能于旧史统贯中映照出现中国种种复杂难解之问题”，为革新现实提供必备之参考。他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写于九一八事变之后，在书中竭力表彰民族气节和爱国传统，用这种写法反映他反对日寇侵略的决心。随后，他由历史研究转入文化研究，极力弘扬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其目的在于为当时的抗战救国寻找精神资源和文化资源，在历史的瀚海中，挖掘出为国人应付时代之变的根据。他研究中国历史的实质就是要“发挥中国民族文化已往之真面目与真精神，阐明其文化经历之真过程，以期解释现在，指示将来”。钱穆的学术生涯蕴含着对国家民族的满腔热忱，他的学术观点和学术论著致力于重建中华人文精神，重建中国人对中华民族的感情和对中国历史的尊重。

